唐诗中的胡姬与现代日本的西域想象

郭雪妮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 日本文学中的胡姬形象无疑来源于唐诗，但其创作的触发点则始于20世纪初日本对“西域”的发现与研究。日本作家渴望突破岛国文化的狭隘视角，以胡姬形象为媒介传达日本人对广袤西域风土的憧憬与想象，并通过虚构胡姬与日本遣唐使的恋情，来证明正是长安这个“文化之道”，沟通了古代日本与“西域”乃至整个世界。

[关键词] 胡姬; 长安; 唐诗; 日本文学; 西域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12)11-0075-05 [收稿日期] 2012-09-04

[作者简介] 郭雪妮，陕西西安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日比较文学、中韩戏剧比较，现于日本中央大学东洋史研究室专攻长安都城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资助文号: 留金发[2012]3013。

引言

“胡姬”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象出现在日本文学中，还只是晚近的事。尽管唐诗的影响显而易见，几乎每一部涉及胡姬的日本小说，都会引用李白、岑参等人吟咏胡姬的诗句。但问题是，唐诗早在平安时代已传入日本，江户时代服部南郭校注的《唐诗选》更是风靡一时，司马辽太郎到访长安时就曾说“我狂热地想唱《唐诗选》中的胡姬诗! 那时候从日本来的遣唐使也一定去过长安城里的酒吧一条街，也进出过胡姬的酒肆，恐怕他们也喝下了红头发蓝眼睛的胡姬用玻璃杯盛满的葡萄酒吧!”[1] 然而，为何直到战后的日本文学中才开始出现“胡姬”形象? 另外，在唐诗影响的延长线上，日本作家笔下的“胡姬”有怎样的继承与变异? 通过考释唐诗中“胡姬”的种族、身份及来源，或许可以接近上述诸问题的本质。

一、关于唐诗中“胡姬”种族、身份和来源的疑问

中国大陆及港台学者关于唐诗中“胡姬”形象的研究，已经颇为深入。无论是就“胡姬”诗所作的文本内部分析，还是就其周边所进行的考古学、社会学、文化学阐释，成果都不能不说丰富。但综观既往研究成果，“胡姬”一词所指大有走向泛化之嫌，甚至有用其统称“胡人女性”的倾向。

据笔者统计分类，《全唐诗》中明显出现“胡姬”一词的诗歌实有16首，① 其中有12首写“酒肆胡姬”，分别是李白的《白鼻騧》《前有一樽酒行二首》其二、《少年行二首》其二、《醉后赠王历阳》《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其一; 岑参的《送宇文南金放后归太原寓居因呈太原郝主簿》《青门歌送东台张判官》; 以及张祜《白鼻騧》、贺朝《赠酒店胡姬》、施肩吾《戏郑申府》、章孝标《少年行》、韩偓《北齐二首》其一。另外4首除岑参的《江行遇梅花之作》，“此鸟衔花胡姬前，胡姬见花知我怜”中的胡姬，“恐怕只是寄托之辞”② 之外，其余3首是温庭筠的《敕勒歌塞北》《赠袁司録》，杨凝的《从军行》，从“羌儿吹玉管，胡姬踏锦花”，“金钗醉就胡姬书，玉管闲留洛客吹”，“汉卒悲箫鼓，胡姬湿采旃”等诗句中不难看出，这些胡姬可能生活在塞外，与长安酒肆侍酒的胡姬并不同。

另外，目前国内许多研究者将白居易、元稹《胡旋女》诗歌中的胡旋舞女也称为“胡姬”③，笔者认为不甚恰当，试析如下。

其一，从时间上看，有“胡姬”一词在先，早在汉代辛延年的《羽林郎》中已有“胡姬年十五，春日自当垆”的诗句。南北朝宫体文学核心人物之一的徐

陵也有《乌栖曲》:“卓女红妆期此夜,胡姬沽酒谁论价。风流荀令好儿郎,偏能傅粉复熏香。”可见,汉代长安已有胡姬酒肆,至唐一代,胡风盛行,长安平康坊、西市、东门一带皆有胡姬酒肆,而“胡姬”一词也就专指酒肆中侍酒的胡人女性。④相较之下,“胡旋舞女”的出现则要晚得多。据向达先生考证,胡旋舞之入中国,当在唐开元、天宝年间。“案胡旋舞出自康国,唐玄宗开元、天宝时,西域康、米、史、俱密诸国屡献胡旋女子,胡旋舞之入中国,当始于斯时。”[2] 法国汉学家谢弗也曾说过“许多胡旋女都是作为礼物,由俱密、史国、米国,特别是由康国的统治者在唐玄宗在位时期,也就是在公元八世纪前半叶被送到唐朝来的。”[3] 另外,唐诗中也并未见用“胡姬”指称“胡旋女”者。

其二,胡旋舞是一种很专业的特技舞蹈,胡旋舞女是作为特殊贡品被进献到长安的,因此在正史中有多处记载。⑤如《旧唐书·志第九》载有“舞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新唐书·志第二十五》载“又有《胡旋舞》,本出康居,以旋转便捷为巧,时又尚之。”《新唐书·西域传》言康国“开元初贡锁子铠……侏儒、胡旋女子。”言米国“开元时献璧、舞筵、师子、胡旋女。”言俱密“开元中献胡旋舞女。”另外,在出土的钱币、石雕、金银器、陶俑、绘画和壁画等文物中所见胡人女性,也可以看到伎乐、舞者的形象。[4] 如敦煌莫高窟初唐第 220 窟北壁药师净土变中,绘有两组双人舞画面,其中一组颇似胡旋舞。[5] 相较之下,关于“胡姬”的记载,除唐诗之外,正史之中极少提到。偶尔发现些零星,却大多都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有关,如《新唐书·西域传》载“葱岭以东俗喜淫,龟兹、于阗置女肆,征其钱。”目前国内已有诸多学者通过考古发现、文书解读等方式证明,唐代长安酒肆中的胡姬,大都是来自中亚、西亚一带被贩卖的女奴。⑥

石田幹之助曾说过“作为进献贡品的胡旋女一般会被直接送入太常寺隶属的教坊,普通庶民大概没有多少机会容易接触到。”[6] 而对酒肆胡姬而言,只要是花钱的顾客都可以轻易地买到她们的笑容。日本作家藤水名子在小说《长安游侠传》中甚至特别描写了胡姬酒肆与平康坊酒楼的差别,“平康坊南北两街的妓馆真是云泥之别。南边的妓楼别致考究、华丽典雅……是专供达官贵臣、豪族子弟、文人墨客出入的地方。而北街逼仄拥挤的酒肆,混乱嘈杂,朱红色的大门恶俗至极。在这一带,大多是供红发紫髯的外国人出入的胡姬酒肆。”[7] 可以说,虽然有的胡姬也能歌善舞,但据《册府元龟》等官方文献,西域诸国进贡的歌舞艺人均称“胡旋女子”,官方不称其为“胡姬”。

总之,单就唐诗文本来看,“胡姬”与“胡旋女”并不尽相同,后人之所以不加区分,大概是因为“胡”字在唐代指涉相当广泛。日本东洋史学者白鸟库吉、藤田丰八等人认为,汉代之后“胡”已为外夷之泛称。白鸟库吉在《东胡考》一文中指出“故胡之一语,在西汉时乃包含数同之一民族之名,至东汉时始渐离其原义,而表示范围乃漠然广泛。……或指印度,或指波斯,或指土耳其斯坦,或指西比利亚,或指朝鲜,或为蛮夷之泛称。与《史记》《汉书》之所谓胡,全异其性质与范围矣。”[8] 因此,大凡高鼻深目的胡人女性都可称之为“胡姬”,正如近代中国将西方舶来之物均冠以“洋”字称谓,举凡法国、英国、德国女性都可被称之为“洋妞”,并不特别区分一样。但事实上,尽管都是胡人女性,“胡姬”与“胡旋舞女”在身份、职业、来源上都有细微差别,并不能一概混淆。

二、日本文学对唐诗中胡姬形象的接受与变异

“胡姬”是作为一个汉语外来词组进入日本的。《大辞林》《广辞苑》《国语大辞典》中均未列词条收录,《大汉语林》中将其作为外来词释义“西、北方异族女性。指来自西域的异族女性。(见后汉辛延年《羽林郎》诗)”。[9] 这显然比《辞海》“胡姬”条的释义要宽泛的多。与唐诗相比,日本文学中的胡姬形象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日本作家对“胡姬”种族的基本理解为“波斯”,在职业上往往将酒肆胡姬与胡旋舞女杂糅在一起。陈舜臣曾在《长安的波斯美女》一文中指出“胡姬指来自异国的女性,尤指波斯系的美女。她们个个能歌善舞,可能还要斟酒赔笑。”[10] 他甚至想象“胡旋舞并不需要十分宽敞的场地。在长安城内窄小的胡姬酒肆中,一定也可以表演胡旋舞吧。”[11] 另外,田中芳树《天山的舞姬》中塑造的波斯胡姬,同样是胡旋舞高手,“随着音乐她一直在跳舞。腾空、回旋,身体无休止地在飞转。……即使是如此迅速地舞蹈,但身形优雅、流丽,几乎是人体美的至高表现。”[12]

尽管日本作家描写胡姬的时候,都会引用唐诗,

但唐诗中“胡姬”的种族并不明晰，那么，日本作家的判断究竟来自何处？将胡姬种族特定为波斯，首先可能与自古以来日本文献对波斯的记载以及日本人对波斯的想象有关。据《续日本书纪》记载“天平八年，入唐副使从五位上中臣，朝臣名代等率‘唐人三人波斯人一人’朝拜”。这里已经出现了“波斯”之名。《扶桑略记》中醍醐天皇延喜二十年十二月条记载“唐僧长秀，与其父共行波斯国之时漂荡海路。”将“波斯”与海难联系在一起，几乎构成了日本海难物语的基本情节模式。《宇津保物语》中，主人公俊荫作为遣唐使赴长安时，途遇海难，就是漂流到了波斯国。“许多人沉了下去，俊荫的船飘到了波斯国”。[13] 关于波斯，文中注释为此地“并非是真的波斯，具体指今天哪一带并不清楚，但从六国史等资料可见，可能是中国的南方等地。”[14] 可见，早在遣唐使时代，日本人已经开始了对波斯的想象。但将“胡姬”视为波斯女性，大概始于日本汉学家石田幹之助的研究。石田氏在《当垆的胡姬》一文中指出，尽管唐代“胡”字指涉有宽窄之分，但具体至“胡姬”之“胡”，则应特指中亚粟特一带，因此“胡姬”也就是指“来自粟特诸国，或者昭武九姓诸国的伊朗系妇女”⑦。

其次，日本作家笔下的“胡姬”，无一例外都极其美貌，她们皮肤白皙、金发碧眼、高鼻红唇，极具诱惑力。石田幹之助是日本较早对胡姬“貌如花”做出阐释的学者之一，“毫无疑问，酒楼中的胡姬容色都极为秀美。”“从这行乐府可见朱颜微醺的胡姬风姿，当垆笑春风，胡姬红唇微启之时，想必那笑靥是极为妖艳的吧！”[15] 之后，作家们从不同角度对李白的“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诗句，做了最大程度上的想象和阐释。伴野郎笔下的波斯胡姬碧儿，“眼睛碧如深渊，像火一样燃烧的头发下，是像白玉一样雕成的精致五官。鼻梁又薄又高，樱桃红唇闪着动人的光芒。[16]”田中芳树塑造的酒肆胡姬，容貌极其美艳“她很高，身体曲线像流水一样柔和，金黄色的蓬松卷发垂至腰际，像天山万年不化的积雪一样白皙的皮肤散发着光芒，玉石雕刻成的面庞上镶嵌着碧青色的眼睛。”[17] 在日本作家笔下，面部轮廓具有雕塑感的胡姬极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同时又与“天山”等西域地貌密不可分。

事实上，唐诗中正面提及胡姬的容貌并不多见。据笔者统计，仅有李白的“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一句为正面描写，“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可看作是侧面烘托，许多学者由此推测，但凡能延客者，想必是美貌的，“素手”一词，也极赞其皮肤白皙。其他诗句如“胡姬酒沪日未午，丝绳玉缸酒如乳”，“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等等，多将胡姬与美酒、春天构成组合意象，侧面烘托其带来的美感。另外，胡姬与其酒肆，作为象征长安的符号，多在送别诗中出现，可以说“胡姬”是长安诗人借以抒情的媒介，至于其外貌并非诗人们描写的重点。

第三，胡姬大多身世悲惨，她们与日本遣唐使上演了一幕幕的异国恋。伴野郎推理小说《长安杀人赋》中的波斯胡姬，生于贫穷的牧羊人之家，五岁时被高价卖到长安学习胡旋舞，她不记得父母的容貌，也想不起家乡的风景。她在长安认识了来自日本的遣唐使，与之真心相爱，不料受人利用染上吸食大麻的恶习，而沦为杀人的工具，最后在薄暮中，从大雁塔上不幸坠塔身亡。在伴野郎的笔墨中，充满了对胡姬的同情与怜悯。

日本作家对胡姬身世的挖掘与同情，是唐诗中所缺少的特有关怀，这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现代学者的研究。石田幹之助在《长安之春》中考证了胡姬的身世，“她们作为人质或政治联姻的牺牲品被送入长安”，远离故土，为人调笑，那种繁华散尽之后的凄楚可能是很多人无法体会的。另外，林梅村先生指出，由于丝绸之路上女奴贸易的发展，大量粟特少女被卖给长安权贵和酒肆。日本伊朗语学者吉田丰对在今吐鲁番出土的粟特文买婢契文书的解读，清晰地揭示了这些女奴的悲惨命运“沙门乘军/以卖主不能赎回的条件将婢女优婆遮买下。她不欠债务，没有财产，无人追寻，/未受非难。所以，他为子、孙、族人及后代买下作为永久财产。/因此，沙门乘军本人及其子、孙、族人和/后代对该婢女有权任意拷打、虐待、捆绑、买卖、抵押/作为礼物赠人，为所欲为。”[18] 可见，这些胡人女奴几乎不享有任何人身自由，可以被任意买卖、打骂、惩罚，身世极为悲惨。

正是怀着对胡姬的同情，日本作家才虚构了大量遣唐使与胡姬的恋情。司马辽太郎在《空海的风景》中想象“在长安的街头巷陌有许多胡姬酒肆，当时的诗人们一定喜欢通过少年的目光来注视那些西域来的碧眼少女，捕捉这种美妙的画面是他们的常态吧。空海走过这样的酒肆时，内心里一定想着

要怎样装扮得更像一个密教的僧侣。”而这种时候，橘逸势大概会揶揄他“真是可怜的僧人”吧![19] 可以说，同为长安零落人的漂泊感，以及语言上的不熟悉，是日本作家虚构胡姬与遣唐使恋情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之，在现代日本文学中，胡姬大都以波斯美女的形象出现。她们既有唐诗中的古典美，又富有唐都长安的时代气息，是混合着波斯古国的悲凉身世、拥有雕塑般美貌的古典美人，又是长安酒吧街上舞姿曼妙、红唇妖艳、多情善饮的性感尤物，她们是长安都市文化的重要符号。

三、胡姬与日本人的西域想象

现代日本作家对“胡姬”的关注与描写，首先源于日本人对西域文化的发现。“西域”作为一个地理名词，始见于汉代文献。但是将“西域作为一个有意识地连接各国历史、语言和宗教来研究的历史世界，却是近代的事情。”[20] 19 世纪下半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帝国——英国和俄国，围绕中亚角逐的战争，是当时国际关系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这个被西方称为“地理上最后的空白”的地区，很快成了西方各国关注的热点。从 1895 年起，来自德国、英国、法国、瑞典、俄国、美国的探险察队纷至沓来，克列门兹、斯坦因、格隆维德尔、伯希和等西方探险家的新发现，促使“西域”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名词，逐渐进入了世界东方学者的研究视野中。

日本京都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对斯坦因等人在西域探险的收获感到极为震惊，遂于 1902 年 8 月从英国伦敦出发取道俄罗斯前往中亚，这也是近代之后日本人与西域最早的接触。1906 年，日俄战争在远东地区的硝烟刚刚散去，日本军官日野强便只身前往西域。他在《伊犁纪行》中详细记载了古西域一带的地形地貌、地质土壤、气候气温、物产植被、饮水、燃料、等自然状况，及人口、民族、城池布局、行政设施、军事防务、交通通讯、宗教信仰、民居民风等社会状况，给日本留下了重要的西域史料。

与此同时，日本的“西域”研究在那珂通世、白鸟库吉、原田淑人、羽田亨、桑原骘藏、藤田丰八等东洋史学者的推动下，大有超过西方之势。尤其是明治 20 年代以来，在甲午战争后日本民族自信高扬与强化的背景下，“日本自觉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亚洲民族，代表了与西洋文明相对的东洋文明”[21] 的趋势，这促使日本学术界在制度上和观念上，都形成了取代“中国史”的“东洋史”，而东洋史与中国史相当不同的一点，就是注意满、蒙、回、藏、鲜，尤其是关注“西域”的研究。

战后最早进入西域的日本人是摄影家滨谷浩和作家檀一雄、草野心平一行。1956 年，他们乘飞机至乌鲁木齐，之后经陆地进入新疆腹地。1957 年，陈舜臣、圆城寺次郎、北川桃雄等人经每日新闻社支援，也进入新疆调查。之后，大批日本作家、学者开始陆续涌入新疆腹地，如藤枝郎、井上靖、司马辽太郎等人。而这一时期，也恰是日本文学中西域题材作品激增的时代，而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井上靖西域题材的系列小说。日本作家普遍认为，日本人对西域的憧憬与幻想，“早在日本文化的根源上，即从遣唐使时代就已经产生了。”“遣唐使们在长安的时候，带回了长安诗人们所写的诗歌，同时也将长安士人对西域的强烈向往带回了日本。”[22] 而这种情绪毫无保留地遗传给了现代日本人。

在井上靖和司马辽太郎等人关于西域的对谈中，井上靖认为，对西域的强烈关心正是日本人最独特的地方，小说家也好，学者也好，对西域的研究与描写远在中国人之上。司马辽太郎与陈舜臣在《对西域无限的憧憬》对谈中说“如果说我们对西域有特别的偏爱，那只能解释为唐代长安的文人们对西域的特殊憧憬——这种憧憬在唐代之后的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被冻结、保存在了日本。……这种印象通过《唐诗选》等文献，深深地沉淀在了我们这些浪漫主义者的心底。”[23]

对日本作家而言，西域也许并非实有的风景，而是一种由历史、语言和想象构成的先验的概念。井上靖在写西域题材的小说之前，并没有到过西域，因此其作品中避免了对西域风景的描写。从地理风土来看，日本位于亚洲大陆东侧，是呈弧形排列的岛国，所有日本的自然景观都小巧而纤丽，四季变化缓慢而有规律，基本上没有受到经常性的大自然的严酷压抑，同时雨量充沛，森林茂密，并经常笼罩在一片雾霭之中，这种柔和甘美的自然景象与西域的广袤、荒凉完全不同，那是由沙海、突兀的岩石、累累的石砾、干涸的河床构成的风景，没有植物，毫无生机，荒凉寂静的令人厌弃。⑧

战后日本作家对西域风景的发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风景观也有时代的变迁，“风景观念在某种程度上的发展，是需要相当的历史，而且根据其

历史，可以理解国民对于风景趣味的程度，还可以从中理解国民的文化程度。”[24] 换言之，日本民族生活的世界非常狭小，几乎没有宏大、严峻的自然景观。随着明治日本的开国，日本人被突然投入到一个未知的世界，同时它强行与每个日本人产生了关联。对西域风景的发现与想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人的风景观和心理的变迁。

另一方面，日本对阿拉伯世界及伊兰系妇女的认识，也影响了日本文学中胡姬形象的塑造。日本和阿拉伯世界的最初接触，源于7—8世纪经由中国传入日本的“波斯”“大食”等语言词汇。可以说，从古代到中世直至近代，日本人关于阿拉伯世界的认识基本上都是以中国为中介获得的。其认识和理解极为有限，甚至出现了许多谬误。明治以来，随着西方观念大量移入日本，欧洲人对阿拉伯世界的偏见也完全被日本接受下来。对欧洲的基督教徒而言，伊斯兰意味着破坏与荒废、恐怖与野蛮，是“右手剑，左手可兰”的残暴的民族，是娶“四房妻室”的异教徒。[25] 伊斯兰教婚约允许男人娶四房妻室，《古兰经》中至高无上的真主说“你们可以择你们爱悦的女人，各娶两妻、三妻、四妻；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地待遇她们，那末，你们只可以各娶一妻，或以你们的女奴为满足。这是更近于公平的。”[26] 这对于信守一夫一妻的基督教徒来说，这种对女性的极为不尊重，简直野蛮至极。欧洲人所描述的暴力且好色、极富攻击性、好战性的伊斯兰形象，就这样毫无保留地渗透到日本社会。可以说，明治日本对阿拉伯世界的看法，主要来源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但这并不足以代表对阿拉伯世界的整体看法，更不符合今天阿拉伯世界的实情。

阿拉伯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在日本的翻译与介绍也折射出日本人对伊朗系女性的看法。1875年，时任日本海军军官学校教师的永峯秀树，根据英文版转译成日文，题名《开卷惊奇 暴夜物语》，这也是日本最早的译本。[27] 永峯秀树汉学修养颇深，“开卷惊奇”就颇有中国明代小说集《拍案惊奇》的意味，“暴夜物语”则取意于统领全书的开篇故事——山鲁亚尔国王残暴成性，每天娶一个处女过夜之后便杀掉。永峯秀树以汉文直译体加和文体交互，并引入“知仁勇”、“孝慈”、“中庸”等儒学、佛学词汇，以教诲的方式传达出伊斯兰妇女地位的低下。[28] 永峯秀树之后，日本陆续出现了许多译本，如矢野龙溪《波斯新说·烈女之名誉》、横山峰一《波斯奇谈·奇遇梦物语》等，也大多将其作为教育训诫读物翻译过来，女人祸水的观念仍然可见。[29]

总之，日本作家对胡姬的描写与想象显然直接来源于唐诗，但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对西域的发现与研究，以及与阿拉伯世界的接触，触发了现代日本社会的“西域热”、“丝绸之路热”，这种热情折射到文学创作中，便出现了大量的胡姬形象。

注　释

①国内先学多引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计算机研究室《全唐诗》数据库检索结果，认为《全唐诗》中“胡姬”诗有23首，如孙立峰《唐代诗歌中胡姬形象的文化意义》(《学习与探索》，1993年02期)，后来者多直接引用此数据。王建军在《透过“胡姬”诗看唐代的民族融合》(《柳州师专学报》2002年03月)一文中修订了这一数据，认为实有15首，并详细列举了各篇胡姬诗在《全唐诗》中的卷数和出处，但王文遗漏了温庭筠的《赠袁司録》一诗。笔者对照检索《全唐诗》数据库，及由北京大学和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共同开发的《全唐诗分析系统数据库》(http://211.166.9.44/tang/)，且核对了由中华书局于1999年出版的增订本《全唐诗》15卷，认为实际上有16首。

②廖立认为“诗中所言胡姬，恐怕只是寄托之辞，勿须考证岑参家中是否真有一个胡姬。这是写诗，不是写史，香草美人，均非实指。”引自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2.10)，页878.

③此类论文不胜枚举，如田峰《从唐诗看唐代胡姬酒肆及其文化》(《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04期)，乌尔沁《外来民间文化的使者：西域胡姬——唐诗胡姬形象解析》(《民族文学研究》2001年04期)，蒙曼《延客与惑君——兼谈唐诗中胡姬形象的塑造》(《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01期)等等。

④《辞海》“胡姬”条曰“唐时旅居长安的西域胡人，有以卖酒为业者，其侍酒胡女称为胡姬。”

⑤详见张庆捷《北朝隋唐粟特的“胡腾舞”》，收录于《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391.

⑥如林梅村《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收录于论文集《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68－79页。温翠芳《唐代长安西市中的胡姬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西域研究》2006年02期)。

⑦石田幹之助『長安の春』东京：讲谈社，1979：63。石田幹之助的这一观点对中国学者影响很大，如台湾学者苏其康《唐诗中的依兰裔胡姬》(《中外文学》第十八卷第一期，22－57)、曾玲玲《唐代“酒家胡”的身份和技艺》(《华夏文明与西方世界》，林中泽主编，博士苑出版社，2003：39－47)等文中，都提出了“胡姬”是伊兰系妇女的观点。

⑧和辻哲郎在《风土》一书中对比了沙漠型风土与季风型风土，根据其观点，日本是典型的季风型风土。陈力卫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37.

参考文献

[1] 井上靖、司馬遼太郎著『西域をゆく』東京：文藝春秋，1998：76.

[2] 向达.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70.

[3] 谢弗. 唐代的外来文明［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18.

(下转第123页)

Management Incentive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2): 225 - 264.

[23] 魏刚. 高级管理层激励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 [J]. 经济研究, 2000(03): 32 - 39.

[24] Gomez - Mejia Luis, Wiseman Robert M.. Reframing Executive Compensation: An Assessment and Outlook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7, 23(3): 291.

[25] Henderson D. Andrew and Fredrickson W. James. Information - Processing Demands as a Determinant of CEO Compens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6, 39(3): 575 - 606.

[26] Zajac Edward J., Westphal James D.. The Symbolic Management of CEO Compensation: Agency vs. Human Resource Justification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Proceedings, 1994: 228 - 232.

[27] 谌新民, 刘善敏. 上市公司经营者报酬结构性差异的实证研究 [J]. 经济研究, 2003(08): 55 - 63.

[28] Hambrick D C, Black S, Fredrickson J W. Executive Leadership of the High - technology Firm: What Is Special about It? [M]. Gomez - Mejia L R, Law less M. W. Advances in Global High - technology Management. CT: JAI Press, 1992.

[29] Geringer J. Michael, Tallman Stephen and Olsen David M., Product and 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 among Japanese multinational firm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21(5): 51 - 80.

[30] 张鸣, 郭思永. 高管薪酬利益驱动下的企业并购 [M]. 财经研究, 2007: 103 - 113.

[31] 薛有志, 周杰. 产品多元化、国际化与公司绩效—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J]. 南开管理评论, 2007(03): 77 - 86.

[32] Morck R., B. Yeung, and M. Zhao. Perspectives on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8, 39(3): 337 - 350.

〔责任编辑: 刘旭挺〕

Internationalization, Industry Growth and Top Management Team Pa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s 2006—2010 Listed Manufacturing Firms*

Xue Qiuzhi　Li Qian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n top management team pay in data on 2006 - 2010 listed manufacturing firms. We find that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gre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the top management team pay. Meanwhile, domestic industry growth rate will negatively moderate this relationship. Thos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determination of top management team pay in China is turning into market - oriented, and the pay is tying in with corporate complexity and outside industry environment, which can reflect the needs of high level human resource. Finally, this paper gives corresponding recommendations on the marketization of top team managers.

Key words: top management team pay; internationalization; industry environment; corporate governance

(上接第 79 页)

[4] 杨瑾. 考古资料所见的唐代胡人女性 [J]. 文博, 2010.03: 26.

[5] 李金梅, 路志峻. 古代中亚的胡旋舞考释 [J]. 敦煌研究, 2010 年 03 期。

[6] 石田幹之助『長安の春』东京: 讲谈社, 1979: 40.

[7] 藤水名子著『あなたの胸で眠りたい: 長安遊侠伝』東京: 集英社, 1994: 16.

[8] 白鸟库吉, 东胡民族考 [M]. 方壮猷译, 商务印书馆, 1934: 14 - 15. _

[9] 镰田正, 米山寅太郎. 大汉语林 [Z]. 大修馆书店, 平成四年六月: 684.

[10] [11] 陈舜臣. 西域余闻 [M]. 吴菲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74, 84.

[12] 田中芳树著『長江落日賦』東京: 徳間書店, 1996: 34.

[13] [14]『竹取物語 宇津保物語』收录于『鑒賞日本古典文学』第 6 卷, 角川書店, 昭和 54 年: 263, 267.

[15] 石田幹之助『長安の春』东京: 讲谈社, 1979: 58.

[16] 伴野郎著『長安殺人賦』東京: 集英社, 1998: 100.

[17] 田中芳树著『長江落日賦』東京: 徳間書店, 1996: 71.

[18] 林梅村. 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 [A]. 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 [D].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5: 68 - 72.

[19] 司马辽太郎. 司马辽太郎全集・第三十九卷 [M]. 文艺春秋, 昭和五十八年: 173.

[20] 葛兆光. 从"西域"到"东海"——一个新历史世界的形成、方法及问题 [J]. 文史哲, 2010 年 01 期: 19.

[21] 江上波夫編『东洋学の系谱』(一), 东京: 大修館书房, 1992: 29 - 30.

[22] 井上靖, 司馬遼太郎『西域をゆく』東京: 文藝春秋, 1998: 74 - 76.

[23] 司馬遼太郎, 陳舜臣『対談: 中国を考える』東京: 文藝春秋, 1983: 209.

[24] 内藤湖南《日本风景观》,《日本文化史研究》储元熹, 卞铁坚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222.

[25] 宝利尚一, 米吉提 玛依拉『日本とイスラーム世界の出会い——明治, 大正, 昭和时代のメデイアを通して』北海学園大学人文论集第 39 号, 26 - 29, 2008 - 03。

[26]《古兰经》4: 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 56 页。

[27] 保坂修司『千夜一夜物語翻訳事始: 前嶋信次訳「アラビアン?ナイト」の歴史的意義について』日本中東学会年報(1), 358 - 383, 1986 - 03 - 31。

[28] 宝利尚一, 米吉提 玛依拉『日本とイスラーム世界の出会い——明治, 大正, 昭和时代のメデイアを通して』北海学園大学人文论集第 39 号, 88 - 89, 2008 - 03。

[29] 波戸愛美:『イスラム世界における女奴隷——「千夜一夜物語」と同時代史料との比較』F - GENSジャーナル 9, 23 - 30, 2007 - 09。

〔责任编辑: 郭洪〕